

# 叶嘉莹先生的诗教特色

齐益寿

(台湾大学中文系,台北)

**摘要:** 中华诗教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春秋至两汉是前一阶段,从魏晋至今是后一阶段。前一阶段是站在用诗的角度,以《诗三百》作为言志、悟理的媒介,产生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和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一阶段是站在作诗、评诗的角度,而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诗歌审美理论的探索,也就是以文人诗的传统为诗教。叶嘉莹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中国古典诗词,无论在诗词的创作、评赏以及审美理论探索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故其诗教的性质,似应属第二阶段,即文人诗传统的诗教才是。然而先生的诗教内涵并不以此为限,而是也斟酌吸收了前一阶段汉儒伦理教化的诗教,并且既凸显又深化孔子诗教中“兴”的作用,从孔子侧重于作人、悟理方面的“兴”,深入到情意领域的兴发感动之力与美。因此先生的诗教特色,是从孔子的“兴观群怨”提炼出诗歌中兴发感动生生不已生命力量,作为其诗教的核心,并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美学理论的探索为其诗教展演的舞台,可说是前后两阶段诗教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 叶嘉莹;诗教;兴观群怨;温柔敦厚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4)04-0060-12

## 一、中华诗教的回顾

中华民族的诗歌特别发达,其诗教亦源远流长。虽然“诗教”之名,始见于《礼记·经解》:“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但“诗教”之实,却久已存在。用诗歌来与人沟通,以产生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这样的诗教,远在西周时代便已露出端倪。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希望诗歌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并非一成不变。在邵公谏厉王止谤的言辞中,便有“故天子之听政也,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的记载,这时的诗教意在发挥政治讽谏的作用,使天子听政作决策时,思虑周详,不致偏颇,不悖于事理,以利政务的推行。可见早期的诗教是从实用的角度着眼的。到了春秋时代,各国君卿执政大臣朝会聘享之际,必赋诗以明己之志,且观人之志。这时的诗教便重在发挥外交的功能,仍然还是发自实用角度的一种诗教。孔子处于春秋末叶,天子式微,

王官失守,礼崩乐坏,乃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诗》《书》教化弟子,大大扩展了诗教的内涵。孔子一方面继承传统诗教的政治外交的功能,既云:“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又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一方面则从读诗教诗的真切感受中领悟诗歌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广泛,而条理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等内涵。“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属知识的层面;“事父事君”属伦理道德的层面。“可以群、可以怨”则触及人与人之间在情理上的共鸣互应。“可以观”,理论上应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事,物无大小,事无巨细,都可以从诗中得到一定的识察、观感等效用,但在孔子所处的语境下,应主要是指为人处世的得失成败方面。“可以兴”可视为孔子诗教的核心,指诗歌对人所产生的感发、联想、领悟等等作用。

杂出于汉儒所辑的《礼记》,以“温柔敦厚”为

诗教,侧重于诗歌对人的语言性情有潜移默化之效。同出自汉儒之手的《诗大序》,其诗教内涵,则大致仍上承孔子。《诗大序》有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中既有“动天地,感鬼神”的“兴”,亦有“正得失、美教化、移风俗”的“观”“群”“怨”,以及对“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的伦理道德的开示诱导。

孔子与汉儒的诗教,都是针对《诗经》或《诗三百》而言的诗教。汉代有杂言的乐府诗兴起,文人又从杂言的乐府诗中提炼出新兴的诗体——五言诗,而有东汉末《古诗十九首》等成熟的作品问世。经过曹氏父子的爱好提倡,建安七子便以文人诗的面貌登上历史的舞台,从此开展出一幅波澜壮阔、诗人辈出、继往开来、长达二千年的举世无双的文人诗独领风骚的历史长卷。西晋太康中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晋宋之际既有齐名的颜谢,又有异军突起的陶渊明;南北朝时江左既有鲍照、江淹、谢朓、沈约等著名诗人,又有由南入北的庾信、徐陵等一代文宗;这些诗人文宗,将我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阶段(从建安至陈灭)的诗坛,点缀得有如天上璀璨的明星。其影响所及,诚如钱志熙教授所言:

经过魏晋南北朝文人诗赋的发展,诗赋创作已成为一种传统,一种大家公认的量才的标准。所以诗与科举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首先是诗的发展促进了诗赋取士制度的建立,然后才是诗赋取士更加推动了诗的发展。在中国古代,至少可以说唐宋之后,写诗差不多是一个文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知识人必备的一种才艺。由此而产生唐诗之后历代文人诗的繁荣,并且还有词、曲等新的诗歌体裁陆续转化为文人词、文人曲。只要稍稍接触中国古代文献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诗歌文献占了其中极大的一部分,……不仅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诗歌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整个东亚文明中,诗歌也是其重要的部份。“汉诗”原原本本地移植到日本、韩国和越南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也都有他们传统的歌谣,但是至少在古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创作汉诗成为他们文学的主要活动,并且同样创作出了汗牛

充栋的诗集。①

在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由于文人诗崛起,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所作不仅质精,而且量多,诗人不仅在诗歌中表现了不同的个性,而且又异中有同地形成琳琅满目的不同的时代风格,如《沧浪诗话》便区别出“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等等。这种既有个性又有时代性的诗歌风貌,迥异于先秦的《诗三百》及两汉的乐府诗,遂在诗坛上形成重视个人创作的新传统。由于重视个人创作的新传统,不但使诗歌创作空前繁荣,也使文学批评大放异彩,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接连问世,络绎不绝,使诗歌创作在言志抒情之外,更注入审美的要求。《典论·论文》既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文赋》在详细铺陈创作前后各阶段所构成的整个过程之外,更标举出不同文类的审美典范,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等。《文心雕龙》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巨著,既重“风骨”又重“情采”,《诗品》专评五言诗,不但提出“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评诗高标准,而且还将诗人作品高下分为三品,选了一百二十人,但凡入评者,不拘上中下等第,钟嵘一律视为才子。

可见从曹丕陆机以来,对诗歌的关照面,已开始从读者如何用诗的角度,向作者如何作诗的角度倾斜。《典论·论文》所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赋》所谓:“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所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都是本于作者的创作经验的论述。因此在六朝,以政教伦理为内涵的诗教,虽然仍有一定的影响,如曹丕《典论·论文》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陆机《文赋》所称诗文之用,亦不脱离“济文武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的政教功能。然而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之相互激荡,相互推进,以致诗人别集及诗

① 钱志熙:《诗的国度,诗的家園》,《温州文史论丛》,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85—86页。

评、诗话一类的著作灿若繁星,历久不衰,与历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共存共荣,既发展出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的文人诗的新局面,又不断吸收到自民间的新体制而加以转化为文人词、文人曲,而合为广义的文人诗,使文人诗的形式风格更加丰富多彩。因此诗歌不但成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其影响且及于域外的日本、韩国、越南等将“汉诗”输入的国家。

缪钺先生生前有一则未刊的简短手稿,后收在《缪钺全集》“第七、八合卷”内,题为《诗教》,全文如下:

中华民族是爱好诗的民族,“诗教”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所谓“诗教”不止是如《礼记·经解》所谓之“温柔敦厚”,而是指孔子所谓“兴、观、群、怨”,也就是诗对于政治、社会、文化、人生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诗应该是最精美的语言,需要高度的艺术性,才能感动人,如醇醪之使人陶醉,但是如果专注重诗之艺术风格,而忽略其在政治、社会上之效益与作用,则也是不全面的。(1991年4月1日)①

这一则仅仅一百多字的手稿,虽未经铺展成为一篇论文,却已将缪先生对有关诗教的想法或论点,撮举得十分警要。中华民族当然是“爱好诗的民族”,从上古歌谣、《诗经》、《楚辞》、汉魏六朝乐府诗及五言诗、唐代的古体诗及近体诗、宋词、元曲,直到白话诗及现代诗,可谓源远流长、波澜壮阔,以致境外的邻国也输入了汉诗。至于“诗教”何以是“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则有待叶嘉莹先生来解答,因为这正是叶先生七十年来诲人不倦、教人不厌的最大动力来源(详后)。而《礼记》“经解”以“温柔敦厚”为诗教,当然不如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教内涵之丰富,能够符应到“诗对于政治、社会、文化、人生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的历史事实。至于缪钺先生说“诗应该是最精美的语言,需要高度的艺术性,才能感动人”,又说“如果专注重诗之艺术风格,而忽略其在政治、社会上之效益与作用,则也是不全面的”。这显然是在讨论诗歌创作与评赏的问题。可见在缪先生的意识中,也是将诗歌的创作与评赏纳入诗教的范围,因为诗教既可以从读者的角度加以应用、评赏,当然更应该

从作者的角度,直接写出诗歌作品,使人兴发感动。中华民族从西周以来的三千多年中,不同形式的诗歌作品层出不穷,同一时代中,往往新旧形式并存,相互衬托,多元发展,像近体诗盛行的唐代,名家诗文中集中,除近体诗外,仍有为数不少的乐府诗和古诗,中晚唐甚至还有词的出现。宋代以词享誉,但文人诗文中,诗的数量往往远多于词的篇幅。学习总要从熟悉既有遗产开始,不了解过去,如何能从现在的表层看到深层,乃至从过去的发展,摸索出未来发展的规律?在文学艺术方面,要熟悉遗产,古人以模拟为有效的快捷方式,书法、绘画如此,诗歌何尝不如此?但诗歌的拟古,往往只是用其意、酌其法,而不师其辞,在模拟中,仍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像陆机著名的《拟行行重行行》《拟明月皎夜光》等十二首拟古诗便是如此。20世纪以后的现代诗,在切断过去传统而试验“横的移植”数十年后,最近半年,连续看到台湾两位著名的现代诗人,将唐诗加以改写的新作,发表于联合报的副刊上,也是用唐诗之意,而发挥想象力的作品,有似陆机的拟古诗作,不知能否为现代诗走出一条在形式与内容上兼顾传承与创新的康庄大道。在过去数十年的现代诗中,也不乏可以朗朗上口足以使人兴发感动之作。可见只要能使人产生兴发感动的功效,在生活中的社会、政治、文化、人生各个层面产生作用及影响,无论是诗歌的创作、评赏,或是诗歌美学理论的探索,都应该纳入诗教的领域。

## 二、叶嘉莹先生的诗教特色

从以上的回顾来看,中华诗教可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春秋至两汉是前一阶段,从魏晋至今是后一阶段。前一阶段是站在“用诗”的角度,以《诗三百》作为言志、悟理的媒介,产生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和汉儒伦理教化的诗教。后一阶段则是站在作诗与评诗的角度,无论《诗经》、《楚辞》、乐府、古诗、近体诗、词、曲乃至现代诗,都可作为学诗及评诗的对象,而以诗歌的创作、评赏以及诗歌审美理论的探索,也就是以文人诗的传统为诗教。

① 《缪钺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叶嘉莹先生将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古典诗词,无论在诗词的创作、评赏以及诗词审美理论的探索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成就。如此,先生的诗教性质,似乎当定位为文人诗传统的诗教才是。然而,先生的诗教内涵并不限于这后一阶段,而是也斟酌吸收了前一阶段汉儒伦理教化的诗教,并且既凸显又深化了孔子诗教中“兴”的作用,视之为中国诗歌的精华、特色。因此先生的诗教,可说是融合了两阶段诗教的集大成者,“集大成”正是叶先生诗教最鲜明的特色所在。先生在《红蕖留梦》中有一段自述平生在古典诗词道路上的种种经验:

回顾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一生。我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的道路;后来为了谋生的需要,又步入古典诗词教学的道路;而为了教学的需要,我又步入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的道路。我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毕竟有限,何况我还经历了诸多忧患。首先是为了教学与科研的工作,而荒忽了诗词的创作,又为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而没能专心于科研。在创作的道路上,我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诗人,在研究的道路上,我也没有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那是因为我在这两条道路上,都没有做出全身心的投入。但是在教学的道路上,虽然我也未必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但我却确实确实为教学工作,投入了我大部分的生命。<sup>①</sup>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三种认识:一是先生对古典诗词是出于童稚天真的爱好,以后竟终生相随,不厌不离,不像王国维在文学与哲学以及小学考据之间辗转徘徊,可见其性情中有极单纯专一与坚忍不拔的一面。二是先生对于古典诗词,是创作、评赏以及理论研究全方位的投入,不像多数学者偏于理论研究而不能创作,以至于所作的评赏难以体贴幽微,切理饬心。三是先生在投入古典诗词的进程上,先由生活中的感发而学习创作,进而由谋生的需要而进入教学评赏,再由

教学评赏中所生的困惑而进入理论探索,直到疑释惑解而后已。这是最自然的进程,迥异于今日不少学者先入为主地以某种理论为依据,去从事评赏或创作,以致其视野不免受到理论的拘牵,而沦为理论的演练而已。此外,先生还对自己在诗词的创作、教学、理论研究三方面的成绩加以自我评量,认为只有在教学评赏方面可说尽心尽力;在诗词创作与理论研究上则未能全身心的投入,因而既未能成为一个好诗人,也未能成为好学者。先生如此自我评量固然是出自谦抑,但也是先生以古今的最高标准来责求自己之故。先生曾对缪钺老前辈纵论词史上有四大变化:

唐五代词人所作为应歌之小令,北宋初欧晏诸公犹承其余风,虽酝藉幽美,而内涵未丰;柳耆卿流连坊曲,采掇新声,大作慢词,开展铺叙之法,使繁复之景物情事能容纳于词中,此一变也。苏东坡具超卓之才华,旷逸之襟抱,以诗法入词,扩展内容,更新境界,此二变也。周清真才情富艳,精通音律,以辞赋之法作词,安排勾勒,叙写情事,密丽精工,此三变也。王静安读康德、叔本华之书,融会西方哲理、美学思想于词中,以小喻大,思致深邃,开古人未有之境,此四变也。<sup>②</sup>

先生既深明词史之“四变”,自己一生又饱经忧患,辗转于大陆、台湾、北美各地,阅历既广,感发日深,而一生诗词创作不稍间断,所作无不称心而言,发乎真挚。先生曾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生命来写自己的诗篇,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sup>③</sup>先生所作的诗词又何尝不是“用生命来写自己的诗篇,用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因此佛学大老赵朴初先生在和先生的《瑶华》词中高度赞美先生的诗词成就:“是悲心参透词心,并世清芬无几。”<sup>④</sup>数学大师陈省身也激赏先生的诗词为:“千年锦绣萃一身”<sup>⑤</sup>。先生自己于当代词人,除了最推崇王国维外,还推崇夏承焘先生为

① 叶嘉莹:《红蕖留梦》,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16页。

② 缪钺:《迦陵诗词稿》“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7页。

③ 《叶嘉莹自选集》“叶嘉莹作品集总序”,天津:南开大学2004年版,第326页。

④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359页。

⑤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371页。

“开继宗风一代尊”的一代宗师<sup>①</sup>,推崇沈祖棻先生为女性词作者中的集大成者<sup>②</sup>。推崇缪钺先生其诗风格兼有晚唐与宋诗之美,两首七言长古(一首三百余字,一首近四百字)为“近世诗坛上不可多得之作”,其词之风格,则小令之蕴藉富华与晏小山为近,长调之清空骚雅又有得于姜白石<sup>③</sup>。夏、沈、缪和先生等数人大概就是赵老眼里的“并世清芬无几”中人吧?

先生又认为沈祖棻先生是清代词史观念的继承者,如所举沈祖棻的一首《浣溪沙》小词以典雅、深隐的风格写出抗日战争中的沉痛:

兰絮三生证果因。冥冥东海乍扬尘。龙鸾交扇拥天人。月里山河连夜缺。云中环佩几回闻? 蓼香一掬忆千春。

中国文化早在隋唐,便惠及日本,所种的是善因,像清香的兰花。但结的却是恶果:是漫天的飞絮;是东海的扬尘;日本以大举入侵相回报。国共两党起先陷于内战,后才转为联合阵线,共拥领袖对外宣战。然而大好河山仍一大块接着一大块消失,就像天上的月亮一夜又一夜缺损下去。老百姓心中悲苦,手持蓼香,年年伫望,但能有几次盼到佳音,有如空中环佩之声那样悦耳呢?先生所作的诗词,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变,境遇的不同,其意境风格虽常有所更新,但其中也不乏词史、诗史一类评弹世局、胸怀苍生之作,如1978年作的《水龙吟·秋日感怀》词下半阙有云:“一水盈盈清浅,向人间做成银汉。阅墙兄弟,难缝尺布,古今同叹。血裔千年,亲朋两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没,同心共举,把长桥架。”国共两党于黄埔军校草创及北伐之初,均彼此合作,亲如兄弟,然而“一尺布,尚可缝”,兄弟竟阅墙而不相容,以致一水之隔竟已三十年(1949—1978)不能往来,有如天上之银河难以攀登,同为炎黄千年子孙,如何忍心使亲朋分散两地,日思夜盼,而不能相见!先生因而祝祷早日泯灭恩仇,共建长桥,携手连心。

先生的祈愿,竟然于十年后的1987年实现。台湾方面宣布解严,两岸开始经香港转机,而互相往来了,不久又由转航更进为直航,从台北至北京天津,只需三小时左右,何等方便!先生这阙词,评弹两岸的僵局,写得气壮情切而辞放,大类苏辛的风格。然而先生除苏辛一类的雄放风格之外,更有风格婉约深微的忧心世态之作,如作于1983年的《蝶恋花》词:

爱向高楼凝望眼。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明月多情来枕畔,九畹滋兰,难忘芳菲愿。消息故园春意晚,花期日日心头算。<sup>④</sup>

这是写日日在心头默计祖国的文化春天何时才能盼到的渴望,写得何等婉约深微!这种心情也出现于同年作的一首七律《高枝》:

高枝珍重护芳菲,未信当年作计非,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所期石炼天能补,但使珠圆月岂亏。祝取重番花事好,故园春梦总依依。(第162页)

先生于1977年偕家人从加拿大返国探亲旅游,恰是四人帮倒台之后,曾兴奋地记其沿途见闻:“在沿途所乘坐的火车,往往看见国内旅客手捧着一册《唐诗三百首》有滋有味地在阅读着。在参观各地古迹时,也往往听到当地的导游人朗朗上口地背诵出古人的佳句名篇。我当时真是说不尽的欢喜,以为祖国虽然经受了不止灾害和磨难,但文化的种子却仍然潜植在广大人民心底。”<sup>⑤</sup>第二年先生便提出回国讲学的申请,而于1979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学,尤其是南开大学日讲诗、夜讲词那一系列的讲座,那种座无虚席、满坑满谷、如醉如痴的景况,使主讲人一次又一次被听讲者的热情所感动。然而好景不常,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社会以经济挂帅,虽然制造业蓬勃发展,出口大增,财富猛聚,消费水平迅速提高,但是

① 叶嘉莹:《迦陵诗词稿》“挽夏承焘先生二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7页。

②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388页。

③ 叶嘉莹:《迦陵杂文集》,台北:桂冠出版社2000年版,第94—98页。

④ 叶嘉莹:《迦陵诗词稿》,第236页。以下同一版本仅列页码。

⑤ 《叶嘉莹自选集》,第337—338页。

一般百姓的文化水平却不升反降,便是修习古典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程度也在下滑,因此先生不免忧心地写出:“忍待千年盼终发,忽惊万点竟飘飞!”然而先生相信这只是一时现象,社会终将调整到经济与文化并重的大道上来。因为一个人只有物质消费能力的提高,而没有精神安顿能力的提高,就像自行车的两轮,前轮灌足了气,后轮一直在漏气,车子是走不远的。先生既抱定要以传承古典诗词的使命回来报效祖国,明知道这美丽的理想神山远在天边——“海阔天遥,一片沧波远”,自己虽只是一只小舟,也要扬起帆帆百折不挠追寻到底——“仿佛神山如可见。孤帆便拟追寻遍。”于是九〇年代后先生在南开大学设立“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又捐出加拿大退休金的半数,成立奖学金与学术基金,致力于“滋兰九畹,树蕙百亩”的栽培工作,珍惜芳菲,护持高枝,年年盼望花期的到来,要亲眼看见万紫千红的春天,热热闹闹地在文化的故园中开得缤纷灿烂。像《蝶亦花》这首风格婉约深微的心怀文化针砭世态之作,同样是具有词史的性质的难得的好词,可与沈祖棻上述的《浣溪沙》词并驾齐驱。

先生不仅词方面有词史之作,诗方面亦有诗史之作,最有代表性的,也许要推1974年的《祖国行长歌》和1977年的《大庆油田行》。这两首七言歌行体长诗,前者266句,1878字;后者124句,853字;是先生从加拿大第一次及第二次回国探亲、访问参观时深受感动、充满激情之作。《祖国行长歌》是写“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何时已”的一个异国游子,在“久经忧患久飘零”之后,忽然回到故乡北京与亲友相聚时的“眼流涕泪心狂喜”之情,在北京不但重游了早年去过的陶然亭、昆明湖、北海公园、故宫、长城、定陵等旧迹,还看到“天安门外广场开,诸馆新建高崔巍”“郊区厂屋如栉比,处处新猷风景异;蔽野葱笼黍稷多,公社良田美无际”而大开眼界。然后开始范围远超过当年司马迁、杜甫等人的“壮游”之举。其所游历之地,涵盖了黄河、长江、钱塘江、漓江、珠江等五大河流域;所访问参观之地,则有山西昔阳的大寨,陕西的延安、西安,上海,浙江的杭州,广西的桂林、阳朔,最后从广州飞返温哥华。这一次壮游,不但使先生眼界大开深受感发,而且决心回国

讲学以报效国家的志意,也由朦胧而日渐清晰起来。在昔阳大寨,她感受到“万千访客岂徒来,定有精神蒙洗涤”;在延安的凤凰山,她低徊于“土窑筹策艰难日,想见成功不等闲”;在西安,她呼吸到一缕古风:“周秦前汉隋唐地,未改河山气象雄”;在骊山她想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悲愤,因玄宗的逸乐而酿成安史之乱的滔天大祸,而发出异代的共鸣:“咫尺荣枯悲杜老,终看鼙鼓动渔阳”;路过上海,便去旧游之地黄浦江边匆匆一瞥,而惊讶于今昔的巨变:“跑马前厅改医院,行乞街头不复见。列强租借早收回,工厂如林皆自建。市民处处做晨操,可见更新觉悟高。改尽奢靡当日习,百年国耻一时消”。从上海到杭州,从桂林到阳朔,一路江山如画,美不胜收,于是写景的佳句络绎不绝蜂拥而出。如写沪杭线火车上的眺望:“采莲人在画图,菜花黄嫩桑麻绿”;如写西湖:“两岸山鬟如染黛,一奁烟水弄阴晴。快意波心乘小艇,更坐山亭淪芳茗。灵鹭飞来仰翠峰,花港观鱼爱红影”;如写桂林:“桂林群山拔地起,怪石奇岩世无比。游神方在碧虚间,盘旋忽入骊宫底。滴乳千年幻百观,瑶台琼树舞龙鸾。此中浑忘人间世,出洞方惊日影残”;如写漓江:“挂席明朝向阳朔,百里舟行真足乐。漓江一水曳柔蓝,两岸青山削碧玉。捕鱼滩上设鱼梁,种竹江干翠影长。艺果山间垂柿柚,此乡生计好风光”。然而这么一大片的游历之胜,山水之美,只是《祖国行长歌》的后半部,前半部则往复于儿时西窗前的明月,八年抗日战争中在北平沦陷区母亡父隔的孤露之哀,还有远嫁离乡渡海赴台后蒙冤茹苦二十年的辛酸岁月,以及糊口于异国已六七年的飘泊无依之悲。一旦飘零近三十年之后,得遂还乡之愿,却又是悲喜交集:喜的是“两弟夫妻四教师,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见吾家佳子弟,辉光仿佛生庭墀”;悲的是“所悲老父天涯歿,未得还乡享此儿孙乐。更悲伯父伯母未见我归来,逝者难回空泪落”。先生这首五十岁所作的平生第一长诗,时间上跨越近半个世纪,经过童稚时的军阀混战,青少年时的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苦难,大学毕业后的国共内战,这些都是人在北平时的遭遇。自从远嫁离乡后,空间

上便由北平而南京,而台湾,而美国东岸及加拿大西岸,横跨整个太平洋和北美大陆。以如此辽阔的时空背景写成的具有诗史性质的长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此诗的风格,可说是兼具李白的奔逸之气、清澈之句与杜甫的沉郁辛酸之情、博大深厚之怀的一种融合,是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诸长诗之后,中国诗歌史上极具震撼力的一首诗史之作。

这首作于1974年的长诗于收入《迦陵诗词稿》后,诗前特加一段按语,表示事后回思当时参观各地时导游人所介绍者“不免因当时政治背景而有不尽真实之处”,但先生诗中所写的却都是“当日自己之真情实感”,并不受导游人或有浮夸之处的影响。先生将此首长诗收在《迦陵自选集》里,成为“古体诗四篇”中的一篇,可见对它的重视。至于另一篇八百多字的《大庆油田行》长诗,诗前有长序云:“……在大庆共留三日,曾参观铁人纪念馆、女子钻井队、女子采油队、创业庄、缝补厂、萨尔图仓库、喇嘛甸联合站、大庆化工厂及铁人学校等地,对大庆艰苦创业精神,深怀感动,因试写长歌一首以纪其事。唯是在大庆之所见闻,皆为古典诗中所未曾有之事物,作者虽有意为融今入古之尝试,然而力不从心,故未能表达大庆之精神及个人之感动于千分之一也。”这首长诗令先生感到“力不从心”,因为在大庆的所见所闻,全是古典诗中从未曾有的新事物,举凡钻探深井前各式各样繁杂的准备工作,开工后各种复杂工序的配合,各种临时突发状况的应变处理,抽出油运输到化工厂后的整套提炼过程等等,这绝非一个普通人所能了解。单是各种机具及其零件的功能名称,亦非一个参访者所能记住,因此描述时当然是“力不从心”。但是先生所观察到的却足以感受到大庆由盐碱荒滩变成工农兼顾的生活乐土所付出的苦干实干、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而大为感动。中国便是凭借这样一个创业精神,二三十年后成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而有“世界工厂”之称。先生这首诗的最后似乎已预告了这样的前景:“吁嗟乎创业艰辛业竟成,飞腾从此展云程。中华举国兴工业,大庆红旗是典型”。

先生的诗词创作,除上述歌行、小令以具有诗史、词史性质而显得醒目突出外,他如近体诗之律

绝,词之长调,其光华照眼、沁人心脾者,不胜枚举。五律如1950年作的《转蓬》(第49页),七律如1981年作的《与缪彦威前辈赠答诗》(第153页),七绝如1976年作的哭女诗十首(第130—131页),长调如1979年作的《水龙吟》(题屈原图像,第222页)、《水调歌头》(题友人梁恩佐先生绘国殇图,第223页)等题画词,还有作于1988年的《瑶华》一首,在莲华开落俯仰今昔的不胜悲凉中,仍隐隐然透出一股清拔之气,予人兴发感动良深,而想起顾随先生的教诲:“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

先生在诗词美学的研究,其用力之勤,探索之深,四十年来,可谓罕有其匹,而所获之成果,亦无与伦比,是继张惠言、王国维等人之后,俨然为一代诗词美学之集大成者,尤其是对词体的特殊美学质量之形成与演进,能做出完整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说明,更是令人望尘莫及。先生从1967年参加美国贞女岛召开的“中国的文学批评”国际会议中提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到2000年撰写《论词之美感特质之形成及反思与世变之关系》,三十几年间完成掷地有声的词学论文、序跋、词学随笔等论著多达数十篇,结集成书者已有《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的诗词道路》、《词学新论》等三种,均收入2000年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一套二十四本《叶嘉莹作品集》中。此后先生又进入女性词作的研究,以“女性词作的美感特质之演进”为主题,以“性别与文化”为理论之依据。先生在去年出版的《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第七章中,设有“中国词学理论的探索”一节,以两万字左右的篇幅介绍各篇论著的旨趣,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细表,仅撮举要旨,略述先生在词学理论探索上的三大贡献:

第一大贡献是对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词》之美学特质的探掘,从歌咏美人爱情的艳歌小词中,叶先生发现一部分优秀之作,有深微幽隐的言外意蕴之美,给这个文类带来一种特殊质量的美感,是士大夫在“诗以言志”“文以载道”之外开启的另一扇文学之窗所见到的一种幽微蕴藉之美,这种特殊的美学质量后来便形成品赏词之美的期待视野,于是,“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遂成为品词的恒久标准。即使北宋、南

宋各出现苏轼、辛弃疾豪放派之词,但苏词的胜境却在于夏敬观先生所说的“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声”的一类作品;辛词的杰作亦在于陈廷焯所指的“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的一类作品,而非一味激昂慷慨不免流于叫嚣之作。叶先生在1992年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的长文中,从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有关女性形象之探讨,领悟出一种“双性心态”的论述,正可用来说明《花间词》全为男性作者,为何要以女性形象、女性语言作为女性叙写的原委,正是由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语言所曲折传达出的深微幽隐的意蕴,引起读者产生意在言外的联想的潜能,使词这个文类创造出特殊的美学质量。当男性作者叙写女子爱情的失意落寞时,无意间也把自己的仕途挫折、不遇知音的潜在的失落感也流露出来。《花间词》这种“以富于深微幽隐的言外之意蕴为美”这一特质,经叶先生加以理论性的说明之后,使人豁然开朗,茅塞顿开,为何纵有“天风海涛之曲”尚非无憾,必须“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方臻词之绝境;为何仅是“气魄雄大”亦非完美,必须“意境沉郁”方为词之极致。后来张惠言的《词选序》说:“词者……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骚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至”;王国《人间词话》也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二人所勾勒的词之特殊质量的美感,也都是以要眇深微富于言外之意蕴为美,与《花间词》正是一脉相承。

第二大贡献是“赋化之词”的提出,先生于80年代初与四川大学缪钺老前辈合作撰写《灵溪词说》此一“千秋大业”,当写到《论周邦彦词》时,对周氏的词所表现出的风格提出“赋笔为词”的说法。然后在1988年撰写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一文中,对唐五代两宋词的发展,正式划分出“歌辞之词”“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三个阶段。先生此一“赋化之词”的提出,对词史与词的创作两方面都为重要。在词史方面,揭举出“赋化之词”,才足

以说明从周邦彦词(特别是长调慢词方面)对南宋词家所产生的极大影响,而造成南北宋词两种不同的质量与风格的演变,并为词史的发展画下句点。因为南宋以后的词作,仍未超出上述三个阶段的范围。在词的创作方面,周邦彦长调慢词的创作,代表词的写作在本质上的一种转变,那就是以铺陈勾勒的思力安排作为写作的动力,是对前面两个阶段以兴发感动为主要写作方式的一种突破。赋化之词,若是内容空洞堆砌形式,当然是失败之作;至于优秀之作则如先生所说:“往往于勾勒中见浑厚,隐曲中见深思,在思力安排之中蕴含深隐之意。只要读者找到这一类词的途径,从思力入手去追寻,自然也可以获得它蕴含于内的一种深思隐意。像周邦彦的《兰陵王》(柳阴直)、《渡江云》(晴岚低楚甸)都是赋化之词中成功之作。这些词可以说在词演进到第三阶段赋化之词以后,仍然保留着属于词的特殊美感。”<sup>①</sup>

先生提出“赋化之词”一说,不仅对词史与词的创作两方面有突破性的贡献,更对词学中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说与王国维的不喜南宋词的偏见,取得高屋建瓴之势,而能对两者之得失利弊,观察得一清二楚。常州词派以比兴寄托诠释唐五代北宋之小令词,往往牵强附会;但用以解读亡国之后的南宋咏物词,往往能深入三昧。王国维以感发联想发挥唐五代北宋小令词的余蕴,往往令人耳目一新,但以之面对南宋词,则往往格格不入。过去对常州派说词与王国维说词两派的优劣纷争,因“赋化之词”的提出,终于可以息鼓休兵了。

第三大贡献是对词的美感特质——要眇幽微之美深探其本质究系何种质素,而有“弱德之美”的理论之建构。此“弱德之美”理论的建构,是在1993年的《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文中提出的。先生发现朱氏《静志居琴趣》所收的爱情词,“写得朴质深厚,别有吞吐不尽之意”,在艺术上完全暗合于自《花间词》以来所形成的以深微幽隐富含言外意蕴为美的美感特质。但朱氏的吞吐不尽,又与“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之情”有所不同,先生同意陈廷焯《白雨斋

①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320页。

词话》中对宋词中的品评：“竹垞艳词，确有所指，不同泛设。其中难言之处，不得不乱以他辞，故为隐语，所以味厚”（《红蕖留梦》，第323页）。朱氏之艳词因“确有所指，不同泛设”，此虽与贤人君子的志意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又有相近之处，先生以为“二者都同是处于外界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得不把自己的情思以委婉的姿态表达出来，但内心在收束约敛中还有对理想的追求和自身品格的操守”，先生于是“对词之美感特质归纳出一个更为触及本质的共性，我姑且称之为‘弱德之美’。这样，我们再反观前代词人的作品，就会发现，凡是被词评家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特质原来都属于‘弱德之美’”。（《红蕖留梦》，第324页）

1998年年初先生为一位研究古代农学的学者石声汉先生的词集《荔尾词存》作序时，对石先生以“忧谗畏讥”为题叙说其写词的经验及体会，油然而生一种共鸣，觉得与“弱德之美”在本质上有相通之处，遂对“弱德之美”的内涵有更清晰的说明：

“弱德”是贤人君子处在强大压力下，仍然能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一种品德，这品德自有它独特的美。“弱”是指个人在外界强大压力下的处境，而“德”是自己内心的持守。“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中国儒家的传统。<sup>①</sup>

先生在词的感美特质上深探更为触及本质的共性，而有“弱德之美”的论述，并推源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在外界强大的压力下，既不能“达则兼善天下”，遂在“独善其身”中仍有所持守、有所完成的修养，这确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是以历代政权可以更迭不断，而文化则绵绵不绝源远流长，且能吸纳外来文化，在充分消化后，更壮大原有的体质。然而这种贤人君子“弱德之美”的品质，何以不能体现于诗文乃至其他艺术如音乐、美术之中，而为词所特有？先生自称其在《朱彝尊》一文中所论尚未细详，仍需补充，我们相信先生或已料到这样的疑问，会在后续的论著

中为之释疑解惑。

先生在诗词创作、诗词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已如此丰硕，至于在诗词评赏方面的成就，当今之世，更不作第二人想。先生于1945年21岁大学毕业后即开始教书，一直到1989年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退休，退休后则半年在南开大学半年在世界各地讲学不辍，连暑假还都在为温哥华的华侨开课多年。像先生这样连续讲课达七十年而不曾间断的经历，恐怕举世少有；先生为古典诗词的评赏所投注的精诚和所付出的辛劳，也是举世罕见。在七十年连续不辍的出于精诚、不辞辛劳的讲学中，与其诗词创作及诗词理论研究的成果相得益彰，因此所作的诗词评赏，无不“深辨甘苦，惬意贵当”，口碑日广，声誉日隆。

小说家陈映真在大学时代旁听过先生的“诗选”课，而留下永难忘怀的一场又一场的永远新奇的“审美的惊诧”（《四十五年前的眉批》）<sup>②</sup>；散文家席慕容在台北听先生演讲《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而感到参预了一次极为丰足的“心灵飨宴”。（《心灵的飨宴——叶嘉莹先生的诗教》）<sup>③</sup>先生的诗评赏词，有如一件艺术品的展示，既给人“审美的惊诧”，又给人“心灵飨宴”，在讲授的艺术中，已臻于极境，这是在得自乃师顾随先生的神髓之外，又有所开发。先生说：“顾先生对诗歌的讲授，真是使我眼界大开。他讲课跟一般老师真是不一样，一般老师讲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而顾先生给我的是心灵的启发。顾先生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而且具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加上他对诗歌有着极敏锐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在讲课时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一片神行。”<sup>④</sup>先生的讲课，除了也是一样“旁征博引、兴会淋漓、那真的是一片神行”，给心灵的启发外，还兼重书本上的知识，绝不忽略知人论世方面。缪钺先生在《迦陵论诗丛稿》“题记”中，对叶先生的诗词评赏之精妙，归纳出四个

①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325页。

② 《叶嘉莹先生八秩华诞暨国际词学研讨会论文集》，第258页。

③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13页。

④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65页。

特点:“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纵观古今”、“融贯中西”并加以精辟的说明,给有志于提升评赏诗词能力的人指出了应当努力的四个面向:

叶君论述古代诗人,先说明其历史背景,思想性格,为人行事以及撰述某诗篇之时、地及人事关系,然后因迹求心,进而探寻诗人之幽旨深情、远想遐思,遂能获鱼忘筌,探骊得珠。并就诗人性格、思想内容,剖析其艺术风格之所以形成,意境韵味之所以独异。此叶君论诗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之特点也。

叶君又用“通古今之变”之观点评论中国诗歌,对于一位诗人、一种体裁、一个主题,常是穷源溯流,探寻其演变之迹,指出其革新之功,既可见古代诗歌生生不息之作用,又为今后新诗之创作指明借鉴之途径。此叶君论诗纵观古今之特点也。

叶君研治中西文学批评,较其同异,各有短长。中国古人论诗,极多精义,然习为象喻之言,简约之语;西方文评,长于思辨,擘肌分理,剖析明畅。中国诗评,宜于意会;西方文论,工于言传。故叶君论诗,汲取中国古人之精言巧譬,而用西方文评思辨之法,准确详尽以辨析之,明白晓畅以表达之,如抽茧剥蕉,如水银泻地,使读者豁然易解。对于古人诗论中神妙难晓之说,如严羽所谓“兴趣”,王士禛所谓“神韵”,王国维所谓“境界”,均能加以科学之解释,义界明确,清除模糊影响之弊,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此叶君论诗融贯中西之特点也。<sup>①</sup>

这四个方面为欲深造者指出了可依循之法门,就像杜甫诗给人留有诗法可学一样,不似李白诗那样飘然云外,无迹可寻。其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前两方面,皆是传统说诗法,不难做到。“纵观古今”方面虽亦未离传统方法,但如此深厚之学养,在今日讲求分工专业的社会,恐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至于“融贯中西”,则是凤毛麟角。先生半生旅居于北美,虽饱尝异乡飘泊、知音难觅之苦,却也结下了“融贯中西”的善缘。

从先生诗词创作、诗词理论研究以及诗词评赏三方面的惊人成就,其诗教应属于第二阶段文人诗传统的诗教,然而先生对自孔子到两汉第一阶段的诗教亦有所提炼发展,首先是对孔子说的“诗可以兴”的“兴”之作用加以深化发展。在《论

语》中,有孔子与子贡、子夏两则涉及《诗经》句子的对话,可以作为“诗可以兴”的意涵的例证。《学而篇》:“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又《八佾篇》:“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从两则对话中,可知“兴”便是“起”,是一种兴起、启发、联想的作用功能,与孔子平日教学生要举一反三是同一道理。然而孔子从《诗经》句子中得到的启发联想,是侧重在做人悟理方面。“贫而乐,富而好礼”的做人境界,当然高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使子贡联想到诗经的“切磋琢磨”之句而受到启发。子夏因孔子“绘事而素”的比喻而感悟到种种礼仪形式都是因时因地而设的后起之物,其根本则在于需先有一颗诚恳敬爱之心。如此深刻的理悟,使孔子都受到启发。先生则从孔子的做人悟理方面,深入到生命中的情意领域,而体悟到融入生命情意的诗歌,因读者会受到它的兴发感动,而获得生生不已的生命。因此先生说:“我一向认为,‘兴’是中国诗歌里真正的精华,是我们中华诗学的特色所在。孔子说过,做人的道理第一就是‘兴于诗’。要知道‘哀莫大于心死’,兴是一种感发,它能使你内心之中产生一种生生不已的活泼的生命,而诗就可以给你这种兴的感发。”<sup>②</sup>又说:“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词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

①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题记”,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7—8 页。

② 叶嘉莹:《红蕖留梦》,第 313 页。

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些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者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会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sup>①</sup>先生从孔子的做人悟理的“兴”的作用,深化到生命情意的力与美,因而发现到诗篇中“兴”的强大的感发作用,因为其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这不但是“兴”义的新发展,而且是先生一生作诗、说诗、研究诗词理论的核心基础。由于诗中“兴”的强大的感发力量,不但使读者个人在相融会相感发的乐趣中得以潜移默化,而且社会伦理也会在此强大的感发力量中受到一定的激荡和影响,因此先生对汉儒“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诗教是肯定的。她在《总序》中又说:“这些活动初看起来,虽似乎不免于夸大而不切实际,但诗歌之富含一种感发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证之于现代西方的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论之说,他们也以为阅读的进行同时也就是一种新的品德的强调(a new moral emphasis),又以为阅读不仅可带领人对自己有更充分的了解(leading to fuller knowledge of the self),而且可以达成一种自我的创造(self creation)”(第13—14页)<sup>②</sup>然而先生却不能苟同于汉儒的“比兴美刺”之说,依政教的需要对诗篇作出刺谁美谁如此既拘狭又牵强的解读。<sup>③</sup>

由此看来,先生的诗教特色,是先对先秦两汉第一阶段的诗教有所取舍发挥,提炼出诗歌中兴发感动生生不已的生命力量为诗教之核心,而以魏晋六朝以下第二阶段的诗词创作、诗词评赏以及诗词美学理论探索作为其诗教展演的舞台,正可说是两个阶段诗教的集大成者。

## 结 语

缪钺先生曾说:“‘诗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精髓。”而中华文化包罗万象,内容丰富,将从何说起?又如何掌握?我们只好提挈纲领,无法穷其枝叶。先生的同门师兄(同出顾随先生门下)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有《中华文化大寻脉》的宏文,正是一篇重要的纲领之作,可收振聋发聩之功。该文说道:

中华文化有两条主脉:一是仁义道德,一是才情灵智。两者会合乃生英才、雄略、哲士、伟人。

此二者貌甚不同,而其深层实质,却同一源,非有歧异。

中华的文化,从字义来看,应该主要是指“人文教化”。此教化是陶冶,是积渐,是潜默——这是一种“感染”的方式与力量,不同于“填鸭”“强制”“训斥”“宣传”。陶冶感染,又主要是诉诸性情,而不以“道理”“教义”“口号”“法令”等为手段,为能事。只给人一种空泛无根的“观念”或“信仰”,也异于中华文化上的“化”的真谛。

“化”的对象是性情,可以因情以明道达理,却不是先“闻道”而后生情,是知“情”方是一切“心理”活动的根源。情与理自有倚伏的关系,而并非天生的冤家仇敌。……情是人之精华,从汉字“造字”来观察,十分清楚:如精,米之质也;清,水之好也;晴,日之美也;……情,人之佳也;靚,妆之美也;……(青,本指一种颜色最美的矿石,天然宝物,“物华天宝”也)是故,情乃“心”之最美好的“部份”无疑。先民体认如此,民族之灵慧所悟也,这是不能反的。以“理”反“情”当然就导致文学艺术的消亡,终致并“文化”而灭绝了。<sup>④</sup>

能在纷纭万状、琳琅满目的中华文化中,看出“仁义道德”与“才情灵智”这两大主脉,这是何等眼力!至于进一步悟出这形貌不同的两大主脉其深层竟是同出一源,这又是何等的“才情灵智”!须是此两大主脉的会合,方能产生诗翁词伯等文学英才,还有哲人、伟人以及雄才大略的一代英雄等等。在中华数千年历史上,江山之所以代代有英才贤杰出现,原来是从两大主脉的会合激荡中脱颖而出啊!

① 《叶嘉莹作品集》“总序”,第10页。

② 请参阅《我的诗词道路》中《进入古典诗词之世界的两支门钥》一文,此处所引为沃夫岗·伊赛尔(Wolfgang Iser)与华尔克·吉布森(Walker Gibson)之说。

③ 《“比兴”之说与“诗可以兴”》,《词学新论》,台北:桂冠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④ 《神州自有连城璧》,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我们三千年的诗教,正是这两大主脉会合的产物,是既高明又有美感的“人文教化”。“他更是以陶冶、积渐、潜默的‘感染’的方式与力量”,使我们被兴发感动,使我们在生命的共鸣中,品德受到陶冶,性情受到潜移默化,并在逐渐积累中培养品德,锻炼情操,提升自己的才情灵智。这与以粗暴的“填鸭、强制、训斥、宣传”等方式,去进行“空泛无根”只会动嘴皮子的种种“道理、教义、口号、法令”的布达,何啻天壤之别!“情”既是人的精华,也是诗教的精华。“情”在诗篇之中,正如先生所说:“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所有的心灵、智能、品格、襟抱和修养”。情与理互相倚伏,并不对立,我们应当“因情以明道达理”,却不宜为理而造情,更不应以煽惑的理论去激暴廉价的情绪。不知可贵的真情与廉价的情绪之差别,使野心家的权力欲得逞,这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哀。只知鼓动廉价的情绪,却不知培养可贵的真情,这样的社会如何能产生“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如何能发展文学艺术等文化的创造力?而诗教则

是建立在可贵的真情之上,三千年来绵绵不绝,不曾因为几度政权为异族所窃据而断灭。这也正是缪钺先生为什么会说“诗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的缘故。

叶先生自讲学上庠以来,六十年中,东奔西走,历经忧患飘零之苦,而矢志不移,为发扬诗教而不辞辛苦,终于取得惊人的成就,为我们民族文化精髓的诗词中所蕴藏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打开了大门,并为我们逐一讲解,仔细品味,她已尽到了文化遗产的重责大任,而衷心期待年轻一代继续传承下去,使这条民族的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今后我们也许要在诗教如何普及推广上,集思广益,有所规划,付诸行动。如果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社会上林林总总的活动中,都多少能接触到诗教的身影,那么在十年后先生的百岁华诞上,也许先生便可含笑向我们宣布,她已看到了神州大地上璀璨夺目的文化的春天,站在云端上的天孙,正垂下一匹绚丽的云锦在向她祝贺呢!①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eh Chiaying's Poetic Education

Qi Yis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oetic education roughly falls into two phases. The earlier phase was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Han Dynasty. The later phase is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until now. In the first phase, *Three Hundred Poems* (《诗三百》) was regarded as a medium of expressing the heart's intent and apprehending principles, when Confucius pointed out that poems may help to inspire, observe, keep company, and express grievances. Confucian scholars explained that poems enable people to be gentle and kind in their words and deeds. In the second phase, poetic education focuses mainly on th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poem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aesthetic theory of poetry,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emphasis on poetic usage in the first phase. Prof. Yeh Chiaying has devoted herself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 and mad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in poetic creation, poetic appreci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aesthetic theory of poetry. Therefore her poetic education is part of the second phase in nature while prudently inherits moral education of Confucian scholars from the earlier phase. At the same time, she emphasizes and deepens the effects of inspiration (兴) advocated by Confucius. In her opinion, inspiration may help not only to evoke one'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express oneself properly, but also to appreciate strength and beauty in emotion and will. Inspiration is the core of Prof. Yeh's poetic education, evoking and touching an endless vitality within poetry, which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r poetic education. The arena of her poetic education is her poetic creation, poetic appreci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aesthetic theory of poetry. Prof. Yeh has absorbed different opinions from the two phases of poetic education.

**Key words:** Yeh Chiaying(叶嘉莹); poetic education; inspire(兴), observe(观), keep company(群) and air grievances(怨); be gentle and kind

① 本文原题《柔蚕枉自丝难尽,可有天孙织锦成——叶嘉莹先生的诗教特色及对文化遗产的期待》,系为“叶嘉莹教授九十华诞暨中华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作。承蒙北京大学钱志熙教授推荐给《北京大学学报》,备感荣幸。惟因篇幅逾限六千字,故将拙稿第三节“对文化遗产的期待”省去,题目亦作调整,其余则一仍旧貌。